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脉络与时代价值

熊晓琳 杨铠溪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发展是接续探索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史，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完善体系和创新演化的百年发展史。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独立自主的鲜明色彩启示发展中国家要自立自强地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体系，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进路的中国回答和时代创造。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4）02—0070—09

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历史探索

实现现代化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识之士徐图自强的宏伟愿望。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正是在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自觉的辩证互动中，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上不断发展。

（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鸦片战争以来，清廷为了维护其统治，曾经实施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行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追赶世界发展潮流、加速其从旧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奠定了物质基础，推动了现代化概念与模式的落地生根，在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逻辑中，实现了第一步的探索。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形成的历史源流来回顾清末以来各阶级的救亡运动，要重新审视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是否形成了较为成型的施政路径，有没有留下较为成型、可供复制的经验，各阶级探索的救亡道路是不是等同于发展新路等关键问题，要重新思考一系列救国措施对于后续探索现代化的运动是否有着积极影响，分析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时期的发展策略是单纯继承了清政府的工业和经济遗产，还是从治理模式上继承了共同的思路，推动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新格局。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严重失衡、竞争激烈的国际背景下，清廷统治下的旧中国以边缘国的身份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所存在的巨大代际差异决定了旧中国不可能在

作者简介：熊晓琳，女，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杨铠溪，男，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短时间内弥补差距达到西方现代化的文明高度。于西方而言，通过鸦片贸易、口岸通商等手段将中国纳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西方列强之所以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其目的绝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追赶世界发展潮流，追寻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将中国作为其殖民地进行原料掠夺和产品倾销，以实现西方列强自身的现代化。中国以受害者身份向施暴者学习经验，其中存在的逻辑倒挂与现实矛盾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会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志之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器物技术的手段试图实现抵御外族侵略的目标。

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首先在制度层面对西方进行模仿学习，以“全变则强，小变则亡”的口号逐渐铺设出一条改革路径，在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设想里，这一现代化路径是基于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的改良，通过政治现代化、人文现代化逐渐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一具有草创性质的道路设计实则后续政策实施开启了重要探索。与英美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是，旧中国的改良并没有极大激发生产力的效能，并未抵御住西方的强力冲击，所以一系列改良救亡措施最终都走向失败。20世纪初清末新政的出台，是在对19世纪晚清现代化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成体系的安排，在这一时期对现代化路径的探索中，清廷以政治立宪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发展目标，同时围绕此目标设计了步骤安排、时间跨度、法律保障、物质依赖等，掀起了全面深刻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建设运动，腐朽统治岌岌可危的清廷在紧要关头运用体制内所具有的一切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来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寄希望于从上到下在维持现有统治的威权性基础之上，希望以层次递进、新陈代谢的方式实现中国从传统的旧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变动。大量法律章程政策的出台提高了工商业者的从业积极性，刺激了民办新式工商企业的创办，中国的近现代历程有了可观的发展速度，客观上清末新政的建设举措为后期现代化提供了大量物质基础，使工业化、城市化逐步走上正轨。然而受限于封建专制制度与现实生产力发展存在的严重脱节矛盾，清政府在寻求维护统治的进程中深陷于更严重的政治危机，并最终亡于现代化变革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与问题激化。

辛亥革命以后，陆续登场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客观上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形成，“中国的现代化”探索逐渐起步。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与理论逻辑来审视这一时期的政策遗产，也要特别关注到在民族意识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式的国家概念逐渐形成，国家治理的相关理念有了践行实验，对于中国将来往何处去、如何去等问题，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形成了一定的进步认识，然而受制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思考与见解始终没有占据时代发展的主流。辛亥革命取得初步成果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迅速被带有封建性质的北洋军阀取代。从封建社会旧土壤中滋生的北洋军阀在中国社会政治体制转变过程中只是在身份上实现了面貌转换，其所代表的仍然是一种杂糅的缝合体制。对于中国的发展前途特别是中国处于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命运等问题，北洋政府寄希望于通过一系列对于西方政治经济等制度的模仿实现发展自强，有意识地开始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然而民国初年仍然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中央集权的破坏和社会中心力量的丧失使得政令无法下达到各地方，轻工业等现代化产业的兴起逐渐呈现出极大的地域分布不均衡。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北洋政府的贡献除发展了部分轻工业、丰富了物质基础、造就了大批产业工人革命力量之外，还表现在以军队军阀的身份承担了清政府到现代社会的中间过渡性力量，加速了传统封建国家制度与概念的消解，从民族意识、国家认同等维度促进了现代化国家的诞生，先进知识分子也逐渐从民主与科学的熏陶中开始思索中国作为整体的多民族国家其国家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发展走向，中国的现代化的探索走向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前夜。

形式上完成统一的国民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以建立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为中心，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政治建设并着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出现了学习复制西方经验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明显趋向。经济活动的自由化、社会生产的工业化、教育的世俗化、社会生活的都市化及推翻封建帝制后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等典型的现代化因素在中国显著增长。客观上形成

了国民政府治下现代化社会逐渐成型的时期，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原有完全以土地资本、土地生产为核心的封建经济结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发展。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试图以自己探索的发展路径找到中国的救亡图存方案，以官僚资本统治为中心建立起封建制度、殖民地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相杂糅的制度体系，在风雨飘摇之中转换了现代化模式。而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随着帝国主义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加剧，列强对落后国家的危机转嫁与原料掠夺愈发激烈，客观上严重阻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则通过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从内部绞杀了中国独立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腐化的南京政府在领导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终完全丧失了民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次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如果还有寻求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那就只能是通过革命来寻求新的路径，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新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①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既植根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充分认识，还表现为以中国实际、中国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运用。马克思在批判资本现代化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新思路，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能够选择符合自身客观实际与发展需要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参考模板。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世界上落后国家与被压迫民族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借鉴的新路范本，而指导十月革命胜利的学说——马克思主义随之也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清末以及北洋政府的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工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大批的无产阶级，为社会变革持续积攒着革命力量。在中国革命进程中，革命不断和现代化的进程开始重合。资产阶级以辛亥革命的方式来谋求与世界现代化接轨，而这一方案的最终破产证实，说明不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就无法真正实现民族命运的自主自决，不能真正开启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推进民族觉醒与国家独立，就要牢牢掌握现代化的主动权，这需要强大的社会中心力量的组织推进。而这一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并积极投身到发动工人青年群众革命的实践中去。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新的领导力量、革命动力、科学理论和目标前途。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身的初心使命。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基本国情，明确了革命领导力量、动力、对象、性质、目标和前途，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寻到了出路。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工作中心的农村现代化建设，通过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有力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根据地建设中已经开始探索政权的经济建设。

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们试图以极小代价渐进改良完成现代化发展目标不同，中国共产党明确了要消灭剥削压迫、实现与旧世界的决裂这一奋斗方向，同时以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科学回答了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辩证关系，把握了二者同向同行的内生联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对未来的政权建设做出历史性前瞻，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而后他对以工业发展为主导来改变中国传统农业生产面貌、提升国际地位寄予期望，以工业国的目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吹响了号角，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被动模仿西方现代化以自强的局面，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主心骨，也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二、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长期探索和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这从根本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性质确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履行宗旨使命的产物，是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内在追求，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产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实践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在基于中国国情基础上领导中华民族进行的斗争、建设和创造。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而理论的深刻阐发又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得以与现实深入互动，在实事求是的探索中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重强调进行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独立思考、自主探索、自力更生，力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实现“第二次结合”，开创了以社会主义救中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成熟、实践上不断丰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不断夯实并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础的重要时期，这为保持中国式现代化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历史连续性提供了重要基础保障。从以计划为主要手段到依靠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从四个现代化纲举目张涵盖主要领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性质属性，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多角度推进现代化到提炼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范式的现代化模式，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式现代化在长期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突破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实现了后来居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为科学合理、更体现公平正义、更契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方案。

深入分析近代以来社会各阶级救亡图存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致力于追求和把握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出的科学认知，在早期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一些领导人通过自身亲历国外的印象，对西方的现代化以及中国当时的落后状况，有着切身体会、强烈比较和深刻认识。在筹备建立新中国期间，周恩来就曾指出：“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②，以此提出了构建新中国现代化国家方案的设想方向。通过与苏联道路及西方模式的对比，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明确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唯有这样才能把发展的基点放到自己身上，在避免更为痛苦的代价的同时能有效有力地发展中国的工业经济，更新产业结构、改善国家面貌、摆脱落后困境。1963年，周恩来指出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从而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协调发展。针对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作出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③。这一时期，党通过一系列政策安排为实现现代化铺设实践路径，积累中国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走向、实践目标、实施方法也愈发明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局势出现了有利新局面的背景中开启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特质在这一时期更集中体现为对苏联旧有范式的突破及对西方一般范式的超越。我们党进一步深化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战略，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多维度的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7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9页。

外延丰富。1979年，邓小平在继承现代化多维并举、多领域并行的建设经验基础上，对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效果水平做出了历史前瞻与科学描绘，他以生发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而又具有全新内涵的“小康之家”作为阶段性目标概括，突出强调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在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这一目标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创造活力。在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目标之后，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任务，党的十三大对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所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等建设要求在内涵上比“四个现代化”更为丰富，充分体现出党在发展理念、预期目标上的认知日臻完善，集中反映了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此后，党的十五大把“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补充，以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全局。党的十六大对“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与衡量标准做出了新的部署，深化了对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发展步骤安排。党的十七大坚持从中国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发展格局的辩证关系出发，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科学回答了我国现代化所应遵循的发展逻辑与价值取向，体现了主客观统一及科学与价值统一的方法论，站稳了现代化建设的人民立场。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领域、新投入不断开拓，增量提质有机结合、同步并行，强国建设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正逐步变为现实，在精准部署与科学战略的落实中，中国梦愈发切实可感、目标可行、实现可期，伟大复兴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以不可逆转的历史姿态由应然向实然迈进。历史与现实充分证实，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

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推进所有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建设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全过程全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概念，并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②。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予以强调确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③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必然。近代以来，地主阶级革新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相继走上现代化的探索之路，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难以完成历史使命，伟大的重担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首先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而后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一步步分阶段、有次序地成功转化为现实实践，从基本生活水平保障的满足，到国力更加富强、生活更为繁荣的新历史情境，中国式现代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页。

化在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同时，也进入了奔向更高目标、创造更多成果、实现更深层变革的发展新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从领导力量、旗帜方向等九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这是党百年来领导推进现代化奋斗进程所形成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为明确新时代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国实际，充分吸收借鉴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始终强调各国由于历史传统、国情、风土人情各不相同，发展道路也各不相同，且没有优劣之分，符合自己国情和传统的道路就是最好的道路，以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展现出兼具现代化共性与本国特色的独特面貌。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逻辑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紧密联动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走出了一条以发展着的先进理论指导前进中的现代化现实需要的科学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做出的系统阐发，从关系原则、宏伟蓝图、领导力量、目标要求等多个角度展开论述，就新时代新的两步走战略作出更详尽的解释部署，这凸显了现代化事业作为有机整体的内生联系，同时也使这一理论体系轮廓愈发清晰、内涵愈发完善、构架更加科学，彰显其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凸显创造性的鲜明风格。

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时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及向更深层次迈进的伟大实践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强大生机活力。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从传统生产向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导推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高效益、创新驱动实现更高产出、社会发展追求更加公平稳定、未来动能致力更加稳定持续，以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步伐、坚实创造，为复兴伟业奠定了雄厚基础。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立场，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目的指向，以新发展理念破局世界各国发展可能遭遇的共性迷思，以理念创新、实践推进等方式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完善了对现代化建设的层次认识与战略安排，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实践中追求现代化发展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二者的有机统一，拓宽人类文明发展前景新道路、丰富发展新样态，彰显了致力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鲜明时代价值。

（一）推动了现代文明实现民族化、本土化省思

由西方生发的现代化文明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补足和完善。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是经济社会，作为一种西方意识形态，西方社会科学一直用经济理性主义来解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但市场交易行为中蕴含的理性只是工具理性，现代科技理性带来的既有提振发展的动力，也暗含着陷阱和失衡。马克思所预见到的各种异化现象，自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的生产力高涨新阶段变得尤为突出，导致了西方发展道路的困滞处境，既有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造成的危机冲突，也涵盖了资本主义无序膨胀引发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严重失调、失衡、失控。这种发展性危机在西方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在世界市场发展扩张初期，尚能通过开辟市场和殖民地的形式来转嫁危机矛盾，而当世界广大地区都进入现代化发展潮流后，转嫁危机的方式也愈发困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探索和新起步就开始于这种现代化危机加剧的时代中，这更决定了中国不能在西方文明的窠臼中自缚手脚，充当现代化的追随者。

反传统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就不可能为大胆革新开辟道路，但作为思想遗产的优秀传统文化决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随意抛弃。中国式现代化没有把民族文化仅仅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补充要素，而是将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维，努力促进其转型发展并与经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赋予了现代化文明以中国特色和民族品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核心前提的感召下，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展“去殖民化”的独立探索，摆脱外来依附、解构西方话语，最终破除了西方对现代化的垄断解释权，形成了现代化叙事的中国话语体系，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立足中国国情、承载中华文明

基因，在国际上形成了浓厚的中国影响，使现代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互动充分彰显生机活力。

（二）摆脱了后发国家依附型现代化民族命运

“依附型现代化”是指某些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由于经济整体实力的落后所以其经济发展受到所依附国家的规模限制。在依附论的观点中，一个国家整体实力不发达是在中心—外围这一资本主义整体框架下受到中心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结果，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主动或被动选择了依附于发达国家产业的形式，用看似更易获取的外部动力取代了本国的内部动力，却犹如产业工人遭受资本家剥削一样陷入被发达资本主义剥削收割的困境。如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

工业革命以来，伴随资本主义全球殖民地的开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多以被裹挟的方式卷入现代化潮流，经济不能自主、命运不能自决，长期以来形成了特殊的殖民依附型现代化。如从历史来看，拉丁美洲在葡萄牙等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了与同时期其他各国相比更为显著的发展速度，如巴西在葡萄牙治下达成了与宗主国的经济结盟，逐渐培育出具有买办性质的金融与商业资本，从而为宗主国提供生产原料、农产品逐渐过渡为向全球市场发展咖啡贸易并获得空前利润，“1889年巴西咖啡产量已达33.516万吨，占巴西出口总额的66.5%，约占当时世界咖啡总产量的57%”^②。咖啡经济的成功为巴西在19世纪步入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农作物经济占主导的产业结构导致巴西工业呈现出畸形发展态势，除与咖啡相关工业产业外，其他领域发展一直处于迟滞状态，依附型现代化从殖民地生产衍生到金融产业领域，致使工业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的巴西在20世纪经济大萧条中丧失了现代化数十年发展的大量成果。再如，自16世纪中叶起，欧洲开始在拉美地区大量攫取白银以支撑本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围绕安第斯山脉主要银矿区也更早实现了从传统经济向以矿业为主的工业化现代化转型。但与发达国家以经济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所形成的物质财富去拉动工业化发展不同，拉美地区在工业体系和内部市场都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直接迈入依赖于单一矿物生产的半工业化时代，其经济结构带有强烈依附他国的特色。当前拉美最不发达的地区恰恰是那些曾经有过出口经济和商业高度繁荣的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与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新一轮的高涨发展交织影响，在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先进技术、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逐步使得这些国家对发达国家形成了技术依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向发达国家购买生产设备、技术专利，只能发展处于产业链末端且严格受限的技术下游产业，抑或投资效益不高的产业，无法有效实现产业升级，国家命运完全受制于人。

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出让本国利益、依附他国经济而顺利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道路不具备现实可能性。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也充分证明，帝国主义列强只专注于在华攫取自身利益，并未想帮助中国从落后危亡的深渊中挣脱，而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所持的或依附于日本或依附于美国的主张，本质上是对帝国主义的相互勾连和对本国利益的大肆出卖，除会对本国新生的民族工业造成严重戕害外毫无可行价值。只有基于民族独立条件下的自力更生才能为现代化不断创造条件、开辟道路。新时代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和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在高筑贸易壁垒、破坏贸易秩序的同时不断试图通过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利用信息差和技术差实现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掌控，以争夺全球市场、打压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对此，中国坚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始终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方面着力完善和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需求侧为导向的健康格局，提升应对世界经济领域发展波动的能力底气。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健全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③。另一方面，中国注重加强科学技术创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② 金计初：《外因在巴西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拉丁美洲研究》1994年第3期。

③ 本报评论员：《夯实筑牢工业“压舱石”》，《经济日报》2022年2月16日。

攻关。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格外重视自主创新，格外重视创新环境建设，努力提升我国产业水平和实力，推动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制造强国转变。”^①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加强与各国合作公益，携手为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而努力。中国所实现的和平崛起打破了原有传统大国“中心—外围”的发展格局，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外围国家、剥削外围国家，中国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关系平等，变阶层关系为朋辈关系。大河有水小河满，中国坚持把本国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共同打造双赢、共赢的现代化发展新路。

（三）形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不仅给予了现代化方案以民族特色和借鉴参考，使其能更好适应中国国情，更从文明发展角度证实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独立于西方发展道路而存在的合理性。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儒教伦理的对比研究，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法律、货币制度等方面探讨了现代东方落后于现代西方的文化背景，也奠定了西方现代化的社会学理论基础。但是韦伯没有否定传统中国有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构因素，也没有认定儒教伦理是阻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因素。西方模式往往主张以全盘西化实现现代化，这是将传统与现代视为互相排斥的两极，认为只有通过传统的完全切割才能进入发展新时期。然而这一自断手足的发展策略是西方凭借地位劣势只针对非西方国家所提出的不平等方案。因为相较于西方社会在其文化传统基础上通过自发演变从而渐进实现现代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起步往往是外源性的，是被西方坚船利炮叩开国门后做出的被动回应。西方模式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彻底告别传统文明，以全盘西化的方式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将各国的传统文明视作了影响现代化发展的障碍，这既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违背，同时也是对其破坏他国发展自主权行为的掩盖粉饰。

以中国古典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有其自身特殊性。于中华文明而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文明交流融合促进自身发展是中国历史的悠久传统。汉代以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西域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原大一统王朝都曾通过与外界通商交流学习先进经验，改良生产技术。自晚清以来，针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冲击，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既不搞全盘西化，也不要保守固化。严复曾就学习西方问题提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②梁启超也指出：“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③民族文化虽不能自动充当现代化的动力，但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利用，却能对现代化过程中潜在的文明陷阱起到导向规避与价值引领作用。

传统是随着时代不断生产的有机体，现代化的变革必然要更新和发展传统。继承传统不是为了回归传统，而是要超越传统。坚持对传统的反思与扬弃，是以道德理性和文明价值对现代工具理性进行优化与补足。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看，中国学习西方现代化、构建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也正是中华文明应对外来冲击，以“冲击—回应”模式完成传统文明重建和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开拓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完善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性生机，“民族复兴的实质是实现中华传统文明到中华现代文明的伟大转型，中华现代文明必将成为中国引领世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④

实现人的现代化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落脚点，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共同价值追求。历经近代以来的探索实践与接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结合实现了科学的理论

① 《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光明日报》2022年8月20日。

② 严复：《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0页。

③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07页。

④ 俞祖华：《中国道路的“两大叙事”：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比较论》，《东岳论丛》2022年第9期。

建构，在破解落后国家发展困局的同时为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全新路径，深刻影响并正在重塑世界现代化格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化解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探索出了一条永续发展、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路。^①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将不断实现内涵深化、优势巩固、形态优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发展出更高质量、更高历史位阶的现代化形态，丰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涵。

Generation Context and Era Value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XIONG Xiao-lin & YANG Kai-xi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points out: “Based on our decade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especially since the launch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as well as the new breakthroughs mad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we have succeeded in advancing and expand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exploration. The century-long struggle history of the CPC is a history of explor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history of improving and innovating the syste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theor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its independent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spires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system with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thus providing China’s answers and epochal crea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 of human society.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陈慧妮、赵蔚平]

^① 参见王雨辰：《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难题的解决及其意义》，《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